

CHARLEMAGNE

昨天和今天的
世界领袖
WORLD LEADERS
PAST AND PRESENT

查理曼大帝

[美] 阿瑟·施莱辛格 主编
[美] 苏珊·班菲尔德 著
施清真 译

法兰克王国之王
中世纪欧洲之父



 中国工人出版社

CHARLEMAGNE 查理曼大帝

[美] 阿瑟·施莱辛格 主编
[美] 苏珊·班菲尔德 著
施清真 译

昨天和今天的
世界领袖
WORLD LEADERS
PAST AND PRESENT

 中国工人出版社

Charlemagne

By Susan Banfield

Copyright © 1986 by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及译本由台湾鹿桥文化公司授权使用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9-649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查理曼大帝 / (美) 班菲尔德著; 施清真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0. 1

(昨天和今天的世界领袖)

ISBN 978-7-5008-4592-8

I. 查… II. ①班…②施… III. 查理大帝, C. (742~814) —传记
IV. K835.657=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716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120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00 千字

印 张: 7.75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一套开拓视野、有助历史反思的书（推荐序一）	何兆武	5
传达进步的历史观（推荐序二）	秦晖	6
左图右史，图文两证（推荐序三）	刘苏里	7
不论是福是祸，领袖能改变历史（原文版序）	阿瑟·施莱辛格	8
1. 恪遵父志		13
2. 年轻时代		21
3. 战场失利		31
4. 扩建帝国		41
5. 定都亚琛		57
6. 教育文化		67
7. 罗马皇帝		79
8. 丰功伟绩		89
大事年表		108
延伸阅读		109
索引		110
图片索引		115

一套开拓视野、有助历史反思的书

推荐序一

何兆武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及其野蛮史）乃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或野蛮）积淀的结果，是历来各个民族的人民都参与其中的人类共业。但是每个人在其中的作用和贡献及其影响却各不相同。我们总是会希望了解历史上所有的人，但实际上往往只能是了解其中少数特别突出的人、个别的人，因为这些人足以代表或集中反映了他们的时代及其特色。《昨天和今天的世界领袖》丛书，就是这样性质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选择了历史上最有特色和最具影响的一百多位历史人物，凝练又不失生动地介绍了他（她）们的生平业绩和影响。

历史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历史学也是不断在进步的。读者们不必把这套书看作历史的定论，但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开拓视野并有助于对历史的反思。毕竟这里的人物确实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最有影响而又最具有典型历史意义的人物。

本丛书每一部均附有丰富的插图，几乎占有一半的篇幅，文字不过五六十页左右。限于篇幅，作者不可能对许多历史问题深入地展开探讨。这些书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为一般读者提供一条清晰的线索，借以了解人类过去的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的历史。如果读者感兴趣的话，不妨再作进一步的深入阅读和研究。本丛书的读者并不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它的目的也只是为一般的读者提供一些初步的知识。

本书的主编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为当今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著有和编纂过多种历史著作，均极为畅销，本丛书尤其具有浅显易读的特色。当然，读者们也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不必一定认同作者的观点和见解。但是阅读作者所叙述的历史事实及其背景，却仍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其价值和影响。

传达进步的历史观

推荐序二

秦 晖

人们的生存状态是有好坏之分的，而好坏之分是有普世标准的，尽管这些标准有多元、相对的一面。例如一个技术先进的时代可能有野蛮的制度，一个战乱不已的时代可能“国家不幸诗人幸”，在文化上群星灿烂。虽然对一些事情的评价会有因文化与传统而异的不同，但是最基本的人文价值还是应该有普世性，我们据以将不同的状态分别称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都未尝不可。

历史学就是要研究这些不同状态之间的演变。但是实证的历史表明，所谓“落后”变“先进”、“野蛮”变“文明”的“必然性”或者“客观规律”并不存在。无论是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全人类“必然”进步的“普遍规律”，还是文化决定论意义上的某个族群“必然”进步或者“必然”落后，都是无法证明的臆说。

因此，历史的本质是非决定论的。人们的状态可能变坏，也可能变好，这取决于人们的选择和努力。在时间上，某些关键点即重大历史契机时期的选择比一般时期的选择更为重要，在选择主体上，某些人的选择对其他人的命运有更大的影响。而且这两种情况还往往互相影响，形成“时势造英雄”或“英雄造时势”。这两种现象都是客观存在，而历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时势”与“英雄”展开的。

在我看来，进步的历史观比起陈腐的历史观，只不过是不再把成为“英雄”的资格看成某些特殊个人的先天特权，而是把“英雄”看作时势与个人的努力的结果。陈腐的历史观相信某些人一生下来就“天纵英明”，而英明的主要表现是有权有势能够役使他人，而我们现在相信成为英雄的机会是向努力的人们开放的，而且英雄应该有益于公众，这并不必然与权势挂钩。杰出的帝王固然是英雄，但像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这样的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作为英雄的资格绝不亚于前者。

我觉得，这就是这套人物传记丛书的价值所在。

左图右史，图文两证

推荐序三

刘苏里

两种情况下，人类往往不厌其烦地回顾自己的历史，一是教育自己的后代，一是遭遇重大挑战和灾难。于后者，是想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勇气与警示；于前者，是企图让后代牢记先辈艰苦卓绝的行动轨迹，伟大卓越的指导行动的思想、智慧与精神。由执美国历史学界牛耳的小施莱辛格挂帅的《昨天和今天的世界领袖》丛书，努力在以上两个方面有所建树：它用巨大规模（遴选百人）、超长历史跨度（2000年），向我们展示了不同人群中那些具有非凡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生平、事迹以及无与伦比的精神状态；对负面人物行迹与思想的呈现，也构成了一代代人类反省自我的养料与资源，让他们回顾先辈光辉荣耀的业绩同时，永远记住那些让人类羞耻的血污。这套丛书另一值得赞赏的努力，是图文两证法的精彩融合，不失平衡——左手图右手史的读者理想，得到有机体现，使后辈读者享受文字信史快感的同时，领略通过图片进入当时历史（人物）情境的风景。

不论是福是祸，领袖能改变历史

原文版序

阿瑟·施莱辛格

有人说，领袖是时代的舵手，推动历史的巨轮往前迈进。领袖这概念肯定个人具有煽动、激励并动员群众的能力，使他们一起行动，朝共同的目标奋斗。其目的无论臧否，伟大的领袖都是那些能名垂青史的男男女女。

今天，领袖这个概念包含了一个论点：个人能改变历史。这一论点从来就没有普遍地被接受。从古到今，著名的思想家视个人只不过是一些更大力量的工具或傀儡，这些力量可能是古代的众神，也可能是现代的种族、阶级、国家、辩证法、人民意志、时代精神，甚至历史本身。违反了这些力量，个人会变得无足轻重。

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Tolstoy）相信历史决定论，在他伟大的小说《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里，有一段非常有名的陈述。托尔斯泰问道：“为什么在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中，有那么多人泯灭了人性，来回驰骋于欧洲大陆，屠杀自己的同类？”托尔斯泰自己回答说：“战争注定要发生，只因为它注定要发生。”所有先前的历史预定了它。至于领袖，托尔斯泰说：“他们只不过是标签，给结果一个名称；正如标签，他们和事件可能只有最小的关联。愈是伟大的领袖，很明显地，他的每一行动愈是必然与命定的。”托尔斯泰说：“领袖是历史的奴隶。”

决定论有许多类型。但“人是历史的奴隶”这一概念却违反了人的天性。严格的决定论废止了人类自由的概念，这概念假定“自由选择”是我们一切言行和思想的基础。严格的决定论也废止了人类责任的概念，因为对于在定义上

人们所无法控制的行为加以奖赏或惩罚，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依决定论的信条而行，必然产生矛盾。

再者，历史也驳斥“个人对历史毫无影响力”这一概念。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位英国政治家，在晚上十点半左右，穿越纽约公园大道，不幸被汽车撞倒。后来他回忆道：“那一刹那，天旋地转，整个人都吓呆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像蛋壳般被压碎。”十四个月后，一位美国政治家，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坐在一辆敞篷车里，遭刺客狙击，结果击中他身边的人。那些相信个人对历史毫无影响力的人不妨想一想，如果康斯坦西诺（Mario Constasino）的车子在一九三一年撞死了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桑格诺（Giuseppe Zangara）的子弹在一九三二年射杀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接下来历史的发展还会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样吗？又假如希特勒（Adolf Hitler）死于一九二三年的慕尼黑街头暴动（Munich Putsch），现在的二十世纪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个人对历史的确具有影响力。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道：“除非透过大大小小的创造者主动积极地去创造，让其他平凡的大众去模仿，人类不可能有任何成就，而这也正是促使人类进步的唯一原动力。伟大的天才为我们指点去路，树立典范，让普通人去遵循。”

詹姆斯认为所谓的领袖，意味思想上以及行动上的领袖。思想上的领袖最后对世界可能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正如威尔逊（Woodrow Wilson）曾说的：“在一般人眼中，行动的领导者才是人们的领袖……新思想便是透过他们，才转化成行动的粗糙语言。”思想上的领袖经常孤孤单单、默默无闻地进行创造，让后代去仿效、遵循；而行动上的领袖——本丛书所描绘的领袖——则必须对其当代产生影响。

行动领袖光凭自己是无法产生影响力的。他们必须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依时代的脉搏而行。他们的天纵之才必须“切合时势”。没有追随者，领袖是毫无作用的。伟大的领袖能转化群众初萌的情感，利用它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他们乘机抓住了当代的希望、恐惧、挫折、危机和各种可能性。只要有事变发生，为他们铺路，只要有正等着唤醒的群众存在，只要他们能提出井然明晰的理念，他们就能成功。领袖接通了个人和群众之间的回路，并因此而改变历史。

不论是福是祸，领袖能改变历史。领袖得为历史上最大的愚行和最恐怖的罪行负责，这些愚行和罪行使人类饱受磨难；对于人类的一些成就，诸如个人自由、宗教和种族容忍、社会正义，以及尊重人权等，他们也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没有一个肯定的方法可以预先告诉我们，怎样的领袖将会造福人群，怎样的领袖将会危害世界。但是当你对本丛书所罗列的领导者作一概略的巡礼，这或可为你提示一些有用的检验方法。

其中有一个检验方法如下：领袖是靠武力或说服来领导？是靠下令或经同意而领导？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领导权都是借着神权的名义在行使，而追随者的义务则是听从和服从。“不必问为什么，只需尽力去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些时候，比方欧洲十八世纪所谓的开明专制君主，他们人道的胸怀，使他们专制的领导显得生气勃勃；但更常见的是：专制主义总是助长了对支配、土地、财富以及征服的热情，并带来暴政。

现代伟大的革命是平等的革命。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概念，逐渐摧毁了旧有的权威、阶级和服从的架构。平等的革命对领导的本质有两种相反的影响，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伟大的论著《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所指出，平等可能意味奴役的平等和自由的平等。

托克维尔写道：“我知道只有两种方法能在政治世界中建立平等。权利必须赋予每个公民，或只赋予一个人，他是全民的主人，除了他以外，任何一个人均不赋予权利。”“在全民主权和一个人的绝对权力之间没有中间地带。”在他对二十世纪极权独裁政治的惊人预言中，他解释了平等革命如何导致了威权主义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怕专制。

但是当权利赋予每一个公民，主权在民建立之后，领导的问题便产生了一个新的风貌，变得比以前更费力，更艰难。借绞绳、火刑柱以及集中营和劳改营的恫吓来发布和施行命令是很容易的，但想靠说理、论证或实际的功绩来软化反对者，并赢得同意，那就困难多了！正如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他首篇联邦主义论文中所写的，他们相信历史正给他们一个机会，去决定人们是否真的能把政府建立在“反省和选择的基础上，或者他们永远都注定要依赖……偶然与暴力”。

奠基于反省和选择的政府，需要一套新的领导和追随模式：领袖必须对公众关切的事务有所反应，追随者在过程中必须是活跃且充分吸收信息的。民主并不将情感从政治的范畴中除去，有时民主会促进煽动性的宣传，但毫无疑问地，你不能永远地欺骗所有的人。

此外，民主也不保证一个德智兼备的政府，因为人民的声音不必然就是上帝的声音。但民主保障反对的权利，这是对抗专制主义内在弊端的天然利器。正如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总结：“人具有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人具有不正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

检验领导的第二个方法是：追求权力的目的是什么？当领袖的目标只是在追逐某一种族的优越霸权，促进极权的革命，获取并剥削殖民地，保护贪婪和特权，或保持个人的权力，那么他们的领导对于促进人类的理想可能鲜有裨益。然而当他们的目标是废止奴隶制度，解放妇女，为穷人和弱势者创造机会，为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利，维护表达和反对的自由，那么他们的领导将会促进人类的自由和福祉。

领袖能危害世界，也能造福世界。在本丛书中，你便可以看到这两种领袖。甚至对于所谓“好的”领袖，也必须谨慎地加以看待。领袖并非神人，没有一个领袖是永无谬误的，每个领袖都必须经常被提醒这一点。谗言会冒犯领袖，但却能拯救他们。盲目的服从不但会使领袖堕落，也贬抑了追随者。塑造领袖崇拜永远是一个错误。幸好英雄崇拜会产生它自己的解毒剂。爱默生（Emerson）说：“每一个英雄最后都变得令人厌烦。”

伟大的领袖鼓励我们依自己最佳的自我而活，并鼓励我们主动积极，不屈不挠，坚定不移，肯定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力。因为伟大的领袖证明人类自由的真实性，反抗历史必然性的假定。他们证明在我们心里头所可能潜藏的智慧 and 力量，这说明了为何林肯（Abraham Lincoln）仍是伟大领袖的最佳榜样。爱默生说：“伟大的领袖为全人类展现新的可能性。”

总之，伟大的领袖借着解放并激发追随者的潜能，以证明他们自身的正当性。于是人类挣扎奋斗，要主宰自己的命运。让我们回想一下托克维尔的话：“每个人的四周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命运圈圈，但在这个圈圈广大的范围内，他是强而有力且自由的；正如个人有个命运的圈圈，团体亦然。”



查理曼大帝（742~814）在一个传统的法兰克典礼中，登基为法兰克国王。国王在典礼中站在盾牌上，然后由贵族们连人带盾牌一起举起，盾牌通常为木制，上面覆着皮革，象征着如果有必要的话，国王愿意为他的人民牺牲自己的生命。

1



恪遵父志

教宗和加洛林（Carlovingian）皇族间的共同职责为，在过去现代、平民和神权历史之间，搭起一座重要的桥梁。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十八世纪的英国史学家，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提出上述观点。

公元七五四年一个冷冽的冬晨，疾风吹过阿尔卑斯山脉（Alps）的丘陵地带，年轻的查理曼王子连日来已徒步越过国内绵延的冰原和荒林。此刻，他不因严寒的气候而感到焦躁，却因兴奋而显得迫不及待，他今天将与教宗会面。

这是教宗有史以来第一次离开罗马，越过阿尔卑斯山，亲访法兰克王国（Frankland）的国王，该国的辖地包括今日的法国部分地区、德国、荷兰和比利时。查理曼将负责迎接教宗，并指引教宗完成此行最后一段旅程。

远方雪地上的小黑点开始愈变愈大，其中一个还闪着类似珠宝的光芒，查理曼早已耳闻教宗身着华丽的镶金服饰，那可能是教宗吗？

查理曼挺胸，同时尽其所能地站得笔直，虽然他年仅十一岁，却已像是成年人，现在，他更急着要扮演一国之君的角色。查理曼深以他的父王为傲，他的父王人称“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是一个英明、公正而勇敢的好国王。查理曼希望给教宗斯德望二世（Stephen II）一个好印象，他紧张得把毛皮斗篷上的金钩子都弄直了。

但当远方行人愈走愈近时，年轻的查理曼完全忘了王室尊严这回事，他着



丕平（714 ~ 768），查理曼的父亲，继承了宫相的职位，等于是真正的掌权者。为了要当个名副其实的君主，丕平在公元七五一年夺取法兰克王位，统治期达十七年。

克洛维一世（466 ~ 511）在继任为法兰克国王十五年之后，于公元四九六年正式受洗成为基督徒。从此以后，法兰克王朝与罗马教廷就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魔似地看着一个威风凛凛、逐渐接近他的身影，阳光在其镶金的外袍和洁白的雪地间闪耀，查理曼不禁想道：一个平凡的国王和这个人比起来算什么？一个人世间的国王何以与教廷之君相抗衡？

查理曼一直希望成为一国之君，并像他父亲一样，勇敢而公正地为人们服务；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早晨，另一个梦想在查理曼心中成形，他希望成为王中之王，竭尽心力为他的上帝和教廷服务。

……早在丕平开始统治法兰克人三百年之前，罗马帝国（Roman Empire）历经蛮族的侵犯，几乎已名存实亡。到了查理曼在阿尔卑斯山晋见教宗之时，



法兰克是欧洲唯一统一的国家。法兰克王国是由五世纪的一位基督教君王克洛维（Clovis）所扩建。

克洛维的后裔统治法兰克人达两百四十年之久，但是这些统治者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于是到了公元七世纪初期，法兰克的国王们成了有名无实的统治者，真正治理国事者是世袭的行政官，称为“官相”（mayors of the palace）。官相们控制全国经济，握有军事大权，人民所效忠的也是这些官相。

公元七五一年，教廷终于正式支持当时法兰克的官相，亦即查理曼的父亲丕平。教宗扎加利（Zacharias）表示：“我们最好将国王之名授予一个有智慧、有实权的人，而不是赠给一个空有头衔的人。”于是教宗将原来的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Childeric III）遣入修道院，并指示丕平接掌法兰克王位。

丕平的登基改变了法兰克王权之本质。在此之前，尽管法兰克的统治者皆为基督徒，他们的行径却很像异教徒，他们将王位的宝座归功于一代代的杀戮。然而丕平却将王权归功于上帝，他是教廷所指派的君王，他视保卫教廷为自身使命，其重要性不下于保卫自己的子民。他和历任教宗的关系相当密切，终其一生都常与罗马教廷通信，扎加利教宗的继任者斯德望二世，是丕平儿子们的教父，而且时常致赠精美昂贵的礼物给查理曼兄弟。

查理曼生于公元七四二年，是丕平的长子，他耳濡目染，自小就深深敬爱教廷。查理曼的母亲贝尔特拉达皇后（Queen Bertrada），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的老师则主持欧洲最著名的修道院。此外，教宗斯德望二世对他的殷切关照，以及丕平国王对教宗的敬爱，想必也令查理曼印象深刻。早在亲临迎接教宗之前，查理曼已经是个虔诚的教徒，终其一生，查

国王安于他所拥有的头衔，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他只有一个名不副实的头衔，以及官相所给予而靠不住的支持。

——艾因哈德（Einhard），九世纪的一位编年史作者，同时也是查理曼的密友，曾书及矮子丕平登基之前法兰克国王们的状况。

教宗扎加利（752年歿）急于得到法兰克人的协助来对抗意大利，因而允许丕平篡夺希尔德里克三世（754年歿）的王位。





法兰克领袖查理·马特 (Charles Martel, 688~741) 在公元七三二年图尔特之役中, 奋勇击退入侵的萨拉森 (Saracen) 士兵。查理·马特是查理曼的祖父, 擅长使用铁制的致命武器, 因而博得“铁锤”的封号, 他把入侵的萨拉森伊斯兰教徒, 赶到欧陆的西南端, 希望借此稳固基督教在欧洲的势力。

理曼都衷心地信奉上帝。

丕平国王使查理曼了解, 支持教廷并不只是交换礼物, 如有必要的话, 一国之君必须冒着牺牲子民生命的危险来保护教宗。

丕平登基不久之后, 他对教宗斯德望二世的忠诚就遭到考验。教宗此行不仅只是友谊性的访问, 他是前来请求丕平协助抵抗虎视眈眈的邻国——伦巴底王国 (Lombards)。

伦巴底和法兰克一样同属日耳曼民族, 两国多年前曾是盟友, 但是丕平与教廷的关系改变了两国的关